

西華大學
四川省人民政府文史研究館
蜀學研究中心主辦

蜀學

第十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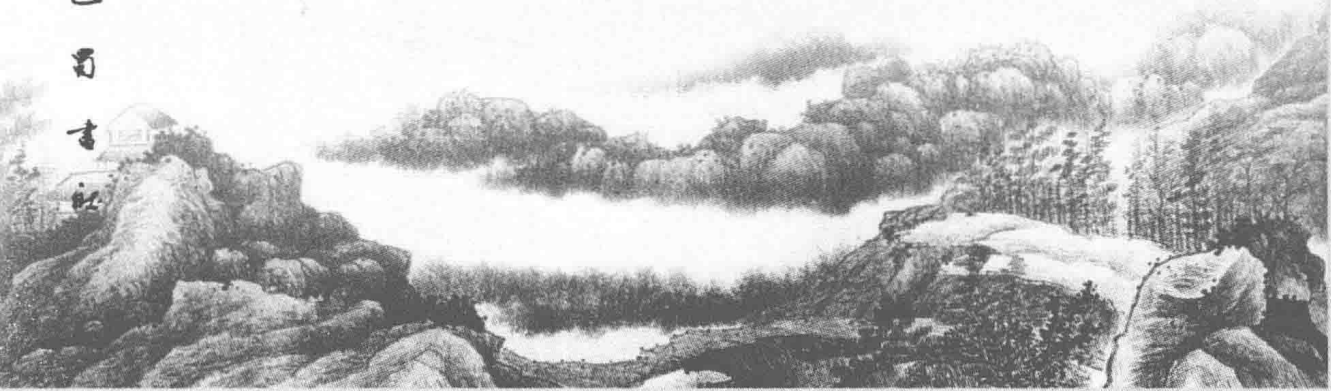
巴蜀書社

西華大學
四川省人民政府文史研究館
蜀學研究中心主辦

蜀學

第十輯

巴蜀書社



圖書在版編目（CIP）數據

蜀學. 第10輯/西華大學, 四川省人民政府文史研究館, 蜀學研究中心主辦. —成都: 巴蜀書社, 2015.12

ISBN 978-7-5531-0621-2

I. ①蜀… II. ①西…②四… III. ①文化史—四川省—文集
②巴蜀文化—文集 IV. ①K297.1-53②K872.71-53

中國版本圖書館 CIP 數據核字 (2015) 第 243671 號

SHU XUE
蜀 學 (第十輯) 西 華 大 學 蜀學研究中心 主辦
四川省人民政府文史研究館

責任編輯	王 雷
封面設計	文小牛
出 版	巴蜀書社 成都市槐樹街2號 郵編 610031 總編室電話: (028) 86259397
網 址	www.bsbook.com
發 行	巴蜀書社 發行科電話: (028) 86259422 86259423
經 銷	新華書店
印 刷	成都春曉印務有限公司 (028-88450462)
版 次	2015 年 12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5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成品尺寸	260mm×185mm
印 張	18.25
字 數	450 千字
書 號	ISBN 978-7-5531-0621-2
定 價	45.00 圓

本書如有印裝質量問題, 請與工廠調換

《蜀學》編輯委員會

顧問 邊慧敏 劉清友 蔡競 王政書
何天谷

編委 (按姓氏筆畫爲序)

王川	王燕飛	王學東	江玉祥
金生揚	屈小強	胡昭曦	祝尚書
紀國泰	陳沫吾	黃開國	張帆
萬光治	粟品孝	舒大剛	鄒禮洪
曾加榮	曾紹敏	曾棗莊	蒙默
蔡東洲	廖久明	劉復生	潘殊閑
謝桃坊	謝應光	譚繼和	

主編 潘殊閑

副主編 謝應光 王學東

執行編審 謝桃坊

《蜀學》第十輯發刊祝辭

團結蜀中學人，
紹繼蜀中學術。
弘傳蜀中文化，
催生蜀中新葩。

邊慧敏

目 錄

先秦兩漢巴蜀書法述略	王萬洪 (1)
漢將軍紀信故里考	馬正平 (7)
相如文君故事的歷代解讀與接受	何煜婷 (17)
近三十年來對司馬相如接受的研究	唐 萍 (35)
樂山揚雄遺迹略考	唐長壽 (40)
陳壽筆法與易代史觀	鍾思遠 (44)
花蕊夫人筆下的成都園林	喻 芳 (53)
宋初直臣田錫出蜀時間新考	汪國林 (59)
蘇軾尺牘校勘記	劉奇晉 (63)
《宋史·魏了翁傳》補正	彭東煥 (80)
張獻忠屠蜀惡行溯考	馮廣宏 (91)
李仙根生平考述	胡傳淮 陳名揚 (104)
李調元與趙翼的交往及互評考論	鄭家治 (124)
李調元的詩學體系	孫文剛 (148)
踏破煙雲又出山——從《近代巴蜀詩鈔》所錄席夔詩看席氏行踪···	高光俊 趙仁春 (161)
成都尊經書院山長考	魏紅翎 (169)
蜀學大儒 維新前驅——記晚清國學碩儒吳之英	李 鏡 (180)
《清代蜀人著述總目》之彭縣著述目錄補正	高光俊 (186)
論郭沫若的三本早期詩集	孔慧怡 彭建華 (194)
對王叔岷抗戰期間所作《民風》詩的初步解讀	胡開全 (204)
略論王叔岷的陶淵明研究——讀《陶淵明詩箋證稿》	王定璋 (211)
試評王叔岷先生的《斟讎學》	王懷成 (220)
王叔岷莊學研究方法管窺	黃金燦 (233)
南川楊啓高：民國學術史上的失蹤者	熊飛宇 (245)

隗瀛濤教授的科研成果和學術特色	謝 放 (255)
元稹治地：巴渠詩人的貌景分走與根脈集合——達州百年詩歌疏議	成都凸凹 (258)
涪江流域詩群：傳統、生態與特徵	胡 亮 (273)

稿 約

先秦兩漢巴蜀書法述略^①

王萬洪

按照大的歷史分期來看，巴蜀書法^②的發展有三個高峰期：一是漢代石刻，二是兩宋帖學，三是現當代碑帖結合的創作實踐；在其餘的歷史階段則處於低谷，有的階段甚至寂然無聞。因此，巴蜀書法整體呈現出 W 字樣的歷史圖示，波峰與波谷之間落差巨大，令人唏噓。本文主要對先秦兩漢時期的巴蜀書法作一簡述，並勾勒出巴蜀書法在源頭上的巨大成就和在中國書法史上的崇高地位。

一 秦治巴蜀時期

公元前 316 年，秦將司馬錯滅巴蜀，巴蜀地區置於秦政權的統治之下。受秦文化與相關政策的影響，巴蜀地區是全國較早使用秦國文字並接受中原文化熏陶和影響的地區。從書法角度看，秦國文字即是後來通用漢字的主體組成部分，巴蜀地區也較早使用了漢字。今存先秦巴蜀書法文獻祇有“青川木牘”一件墨書真迹作品在全國較有影響^③。在沒有其他實物文

① 本文為朱存明教授主持的國家社科基金重大招標專案“漢學大系編纂及海外傳播研究”（14ZDB029）規劃子項目《漢代書法研究》與西華大學校社科重點研究項目《宋代巴蜀書法研究》（編號：zw1410731）的階段性研究成果。

② 本文所指的巴蜀書法，其文字載體是今天使用的漢字，而不是指秦滅巴蜀以前巴蜀地域文化意義上的巴蜀文字。巴蜀文字今已不傳，其與巴蜀書法繪畫裝飾藝術的關係，本論文暫不討論。特此說明。

③ 被認為是紀念大禹治水偉大功績的《禹王碑》是先秦碑刻的代表。因《禹王碑》最先發現於衡山岫巖峰，又稱《岫巖碑》，與黃帝陵、炎帝陵被文物保護界譽為中華民族的三大瑰寶。今西安碑林、紹興大禹陵、雲南法華山、武昌黃鶴樓、四川北川大禹故里、河南汲縣、湖北漢陽等處，均以此碑為藍本翻刻。當前，學術界對《禹王碑》碑文的研究仍然處於束手無策的境地，尚有待後來者破解。《禹王碑》是中國最古老的碑刻，碑上刻有奇特的古篆文，字形如蝌蚪，既不同於甲骨鐘鼎，也不同於籀文蝌蚪，蒼古難辨，因此不屬於本選題以通行漢字為文字形式的要求，故不多作討論。

獻為證的情況下，暫時無法討論本期巴蜀書法的實際狀態^①。

二 輝煌壯麗的兩漢時期

兩漢四百多年的歷史中，巴蜀書法迎來了第一個發展高峰期。其時，伴隨國家統一、領土擴張、交通地理與對外經濟貿易發展等因素的變化，巴蜀地理、文化、經濟、政治地位越來越高，巴蜀書法在全國占據了重要的地位，不僅存世文獻衆多，而且大部分在書法史上聲名顯赫，獨樹一幟，成為後代研究金石學、交通史、地理學、文獻學、考古學、宗教學、歷史學、文學、建築、雕塑等科目部類的重要實物文獻。從書法文獻載體與書法藝術水準的角度看，巴蜀漢代書法主要以摩崖、碑刻、漢闕為主，另有少量磚銘、棺槨書迹存世；簡牘與紙帛書則沒有發現過。水準最高、影響最大的是幾通摩崖刻石。

漢代巴蜀摩崖刻石的代表作品有四：《閣道碑》、《大開通》、《石門頌》和《楊淮表記》，其中最著名的是《石門頌》。《閣道碑》本世紀初在雅安市榮經縣民建鄉絲綢古道邊的石崖上被發現，全稱《蜀郡太守何君閣道碑》，東漢建武帝中元二年（57）刻，這是史有記載，但是近兩千年未曾見物的國寶，從楊慎《全蜀藝文志》等文獻記錄來看，《閣道碑》在時間上是東漢所有摩崖石刻中的第一件作品。《郫君開通褒斜道刻石》，俗稱《大開通》或《開道碑》，刻於東漢永平九年（66），銘文記載永平六年時漢中太守鉅鹿郫君奉詔受廣漢、蜀郡、巴郡刑徒二千六百九十人，動工開通褒斜棧道之事；《大開通》是著名的“石門十三品”之首，在《何君閣道碑》重現天日之前，稱為東漢第一刻石。這兩處摩崖刻石，不僅在時間上占據了東漢摩崖石刻的第一位和第二位，而且書法風格極為近似，筆畫圓整雄強，開張大氣，章法疏密有致，以篆書之法直筆寫隸書，是漢代書法由篆及隸的典型代表。《石門頌》全稱《漢司隸校尉犍為楊君頌》，又稱《楊孟文頌》，東漢建和二年（148）十一月刻，摩崖隸書，內容為漢中太守王升表彰先鄉賢楊孟文開鑿石門通道的功績，王升撰文並書丹。楊孟文與王升均為犍為郡武陽縣人，因此，在“石門十三品”中書法水準最高的《石門頌》摩崖刻石，成為巴蜀書法史上最傑出的石刻書法作品。漢中褒谷口是褒斜道最險要的隘口，絕壁陡峻，山崖邊水流湍急，很難架設棧道。東漢永平年間，漢明帝下詔在最險之處開鑿穿山隧道，歷時六年而成，古稱“石門”。東壁長 16.5 米，西壁長 15 米，南口高 3.45 米、寬 4.4 米，北口高 3.75 米、寬 4.1 米，隧道與棧道在同一條水平線上。褒斜石門是世界上較早的人工交通隧道之一，《石門頌》即記述此事，今藏漢中博物館。《石門頌》被稱為草隸鼻祖和楷模，大氣磅礴，揮灑自如，既整齊規範，又富於變化，不拘繩墨，筆勢縱放，奇趣橫生，筆畫粗細雖區別不大，但每一筆畫都變化多端，用筆揮灑自如，不作修

^① 有研究者提出：秦滅巴蜀之後，將蜀人趕盡殺絕，古蜀文化盡然無存，古蜀文字從此毀滅，並退出了歷史舞臺；秦國統治巴蜀，強制性地推行秦國文字而廢、滅古蜀文字，所以，古巴蜀書法無從討論。這裏暫不對此發表爭論意見。

琢，有自然豪放意趣。整體字畫瘦硬，結構疏朗，飄逸有致，隸中帶篆、帶草、帶行，被書家稱為“隸中之草”。楊守敬《平碑記》說：“其行筆真如野鶴閑鷗，飄飄欲仙，六朝疏秀一脈，皆從此出。”飄逸、開張、大氣、野趣，《石門頌》成為巴蜀地域文化影響下具有獨特風格的代表之作，其影響之巨，受評價之高，堪稱輝煌！^①《楊淮表記》刻於東漢熹平二年（173），全稱《司隸校尉楊淮從事下邳楊弼表記》，亦稱《楊淮碑》。楊淮、楊弼兄弟是《石門頌》中司隸校尉楊孟文之孫。東漢熹平二年二月，同郡卞玉過石門，見《石門頌》，有感於楊氏祖孫業績，因作此表紀，故又稱《卞玉過石門頌表紀》。該碑書法奇逸古雅，與《石門頌》相近，而影響稍次。從上述四通摩崖刻石的名稱上看，古為“摩崖”者，也時常以“碑”稱之，這和專指樹立之碑不同。

巴蜀漢碑的代表作品有《揚量買山刻石》、《會仙友碑》、《孟孝琚碑》、《樊敏碑》、《趙儀碑》等。《揚量買山刻石》刻於西漢宣帝劉詢地節二年（前68），清代在四川巴縣出土。此石之可貴首先在於西漢石刻文獻傳世稀少，其次在於其字體取勢扁方，波磔畢具，為成熟漢隸之最早標本，極受書法史家的重視。《會仙友碑》又名《會仙友題字》、《漢安仙集字》、《漢逍遙山石窟題字》，刻於東漢漢安元年（142），原碑在今簡陽市三星區踏水鎮逍遙洞巖壁上，存“漢安元年四月十八日會仙友”十二字。清乾隆五十一年（1786）申兆定摹刻於《裴岑紀功碑》之陰，今在西安碑林。“文革”中原碑已毀，現存碑刻為搨片複製，存於簡陽白塔園、四川省博物館、西安碑林等處。《會仙友碑》書法古質而奇妙，康有為《廣藝舟雙楫》先後四次盛贊該碑，認為它是書法演變由秦篆到漢隸的代表性過渡實物證據，“古茂雄深，得秦相筆意”。《會仙友碑》歷來為書家、學者所重，是研究金石學、書法學、宗教學的重要碑刻，尤其是作為道教發源於四川的堅實證據，意義重大。《孟孝琚碑》刻於東漢永壽三年（157），是雲南省今存唯一漢碑，碑在昭通第三中學。碑文敘述了南中大姓之一的孟廣宗（字孝琚）12歲隨父到武陽縣學《韓詩》、《孝經》，博覽群書，後未婚而死，其父之下屬為表示哀悼而刻此碑送回他的家鄉昭通。碑的形體、文辭、書法都是東漢盛行的風格，是研究古代西南民族史的珍貴實物史料。雲南昭通古屬犍為郡，孟孝琚之父時任武陽縣令，孟孝琚學儒學於武陽，聘“蜀郡何彥珍女”，未娶而夭亡於斯，此碑刻製於武陽，故歸入巴蜀漢碑之內。光緒二十七年（1901）五月，於昭通白泥井出土。《孟孝琚碑》書法蒼勁，文辭典雅，渾樸古茂，近似於東漢著名摩崖刻石《西狹頌》，是東漢成熟隸書的典型代表。《樊敏碑》於東漢建安十年（205）三月、《趙儀碑》於建安十三年（208）十一月先後立於四川省蘆山縣，在影響上不及上述二碑。不過《樊敏碑》進入了陶宗儀《書史會要》

① 《石門頌》與略陽《郾閣頌》、甘肅成縣《西狹頌》並稱為“漢三頌”，是東漢隸書的極品，又是摩崖石刻的代表作。它對後來的書法藝術發展產生了巨大的影響，被人們稱之為國之瑰寶。清代張祖翼評說：“三百年來習漢碑者不知凡幾，竟無人學《石門頌》者，蓋其雄厚奔放之氣，膽怯者不敢學也，力弱者不能學也。”僅就筆者所見，《石門頌》運用就十分廣泛：新中國成立前商務印書館出版的《辭海》封面“辭海”二字，就取自於《石門頌》；今湖南長沙嶽麓書院朱張會講大殿正門一副對聯十八字，是集《石門頌》字而成；今成都武侯祠“廣益堂”橫匾是意臨《石門頌》字而成；今四川省書協主席何應輝先生書法主要是學《石門頌》而成，並影響了一大批追隨者和學生弟子；如此等等。

一書的論述，陶氏論曰：“劉惔隸書巴郡太守《繁敏碑》。碑下有云：石工劉（或習）惔書者，劉刻其石而厥子落筆也。”陶氏所錄之《繁敏碑》即《樊敏碑》^①，書法水準和歷史影響上高於《趙儀碑》。

2010年10月，成都天府廣場東御街人防工程施工現場，發掘出兩塊東漢晚期大型紀事碑，稱為《裴君紀功碑》與《李君紀功碑》，這兩塊碑分別於公元146年和152年刻製，一大一小，小碑存字800多字，大碑存字1200多字，不僅是東漢現存碑刻中難得一見的字數衆多的實物，保存了大量的歷史文獻證據，對研究巴蜀東漢文化意義重大，同時，在書法藝術上也有很高的水準。目前，成都市博物館正在組織專家對這兩塊漢碑進行研究。從2004年榮經縣發現千年國寶《閣道碑》、2006年蘆山縣發現《趙儀碑》，到2010年天府廣場一次性出土兩塊大型珍貴漢碑，四川古代碑刻出土形勢喜人，值得今人好好保護、學習、研究。

另外，在碑刻名稱上有“漢益州太守”的《景君碑》，有“漢益州刺史”的《李孟初碑》，碑主人曾在蜀地為太守或主官，碑文記載他們的德行政治與教化功績，與巴蜀相關，但碑刻保存不在巴蜀。

巴蜀漢闕的代表是位於雅安市城市建設新區漢闕博物館的《高頤闕》，這是我國今存唯一一座碑、闕、墓、神道、石獸完整保存的漢闕實物。另外兩座著名的漢闕是：位於梓潼縣長卿鎮南橋村的《李業闕》，建武十二年（36）修建，為全國今存漢闕之最早者；位於新都縣彌牟鎮的《王稚子闕》，建於東漢和帝元興元年（106）。這三處漢闕不僅文物價值高，在碑文字數與書法水準上也居於全國前列。

本期屬於中國書法理論的萌芽期。巴蜀書論在本期雖無成熟之作，但西漢著名文學家、學者揚雄提出的“心聲心畫”說，成為後代人書關係論的基本源頭，也是中國書法理論正式開始獨立研究自身本質問題的開端，從揚雄開始，書法理論開始獨立存在。從西漢到當代，歷史上論述“心聲心畫”問題的書家書論層出不窮，大多屬於儒家書論的範圍，影響深遠。

在名作雲湧的兩漢時期，巴蜀大地為漢代書法貢獻了許多著名的書法家，他們名垂青史，光耀千秋。《石門頌》的刻製者王升，犍為郡武陽縣人。儘管沒有留下其他作品，僅憑《石門頌》，已足以千古不朽！在他之前的揚雄，是歷代公認的大書法家：當代華人德先生撰《中國書法史：兩漢卷》，列揚雄為兩漢第一書法家，推崇備至！其實華先生的推崇並不算高，在以南朝王愔《文字志》、元人陶宗儀《書史會要》等為代表的歷代著名書法理論著作中，就明確記錄了本期巴蜀書法名家司馬相如、揚雄等人的書法事迹。《書史會要》卷二《漢》所述第四人即為揚雄，論曰：

揚雄字子雲，蜀郡成都人。四十為郎，三世不遷，終於大夫。善古文，識奇字。自伏羲命朱襄作六書，黃帝命倉頡制文字，下及唐虞、三代，通謂之古文。至周史籀始著《大篆》十五篇，損益古文，或同或異，所謂奇字也。古人之書，殊文者多。秦兼天

① 本條材料的確定，得到了四川大學侯開嘉教授和四川省文史館楊代欣先生的指導，在此向兩位前輩致敬！

下，丞相李斯乃罷其不合秦文者，強而同之，遂作《倉頡》篇，所謂小篆是也。程邈變小篆為隸書，而王次仲復增廣之，於是古文廢而不用。漢興，李書師以《倉頡》之學教於鄉里。孝宣時始命諸儒修《倉頡》之學，召通《倉頡》讀者，張敞從而授之，杜鄴、爰禮、秦近亦能言之。孝平時召禮百餘人，令說文字。未央官中以禮為小學元士。雄為黃門侍郎，采以作《訓纂》篇，凡三十四章。又易《倉頡》重複之字，為八十九章^①。

根據本段記載，秦相李斯改古文、大篆為小篆，作《倉頡》篇傳世，這是罷六國文字之“不合秦文者，強而同之”的結果。實際上，經李斯整理的小篆，就是後來通行漢字的祖本。在漢宣帝執政之前，古文曾被廢棄不用，祇有李書師“以《倉頡》之學教於鄉里”。在漢宣帝時，因古文經學興起，而能識讀古文者寡，故官方下令“諸儒修《倉頡》之學”，於是張敞、杜鄴、爰禮、秦近等人研修《倉頡》篇，並以此名顯當時。揚雄在前人基礎上作《訓纂》篇，再將《倉頡》篇進行改編，成八十九章，終成一家之學術著作。因此，揚雄是漢代古文、奇字的實際總結者，具有很高的文字學成就。他的貢獻是在前人基礎之上作出的，《書史會要》曰：

李書師合秦小篆三篇，書之，總謂之《倉頡》篇。斷六十字為一章，凡五十五章。以教於鄉里。

張敞字子高，河東平陽人。官至冀州刺史。

杜鄴字子夏，魏都繁陽人。官至涼州刺史。

爰禮官小學元士，沛人。

秦近官講學大夫。

已上四人皆善古文，通《倉頡》篇^②。

漢代巴蜀地區之所以能出現揚雄這樣的古文字學大家，除了揚雄博采衆人之成果外，與漢代辭賦宗師蜀人司馬相如也大有關係。司馬相如被後人尊為“賦聖”，寫辭賦首先就要識別和運用古文奇字。《書史會要》曰：

司馬相如字長卿，蜀郡成都人，官至孝文園令，作《凡將》篇。誠書文之林苑，妙辨六律，測尋二氣，采日辰之會，屈伸其體，升伏其勢，識象四時之氣，為之興降象形焉，曰氣候直時書。又後漢東陽公徐安子搜諸史籀，得十二時書，皆象神形也^③。

司馬相如所作之《凡將》篇，謂之“氣候直時書”，實則乃象形文字之一體，也就是大篆書之一體，“徐安子搜諸史籀，得十二時書，皆象神形”的補充記載，證明司馬相如在無意間繼承（興復）了史籀創造的象形體大篆，將已經中斷的大篆傳統延續了下來——蜀地

① [元] 陶宗儀撰：《書史會要》，上海書畫出版社1992年版，第79頁。

② [元] 陶宗儀撰：《書史會要》，上海書畫出版社1992年版，第80頁。

③ [元] 陶宗儀撰：《書史會要》，上海書畫出版社1992年版，第82頁。

古文字學自有傳統。據《漢書·揚雄傳》等文獻記載：揚雄少年時代極為仰慕司馬相如，渴望創作“宏博絕麗之文”，遂模仿而作辭賦，最終成為一代漢賦絕手。揚、馬俱為漢代辭賦大師，辭賦寫作的一個要素就是認識和運用“奇字”，因此，他們的書法成就主要是在文字學上，這是史有詳錄的事實，此處不再展開討論。

三 結 語

綜上所述，先秦巴蜀書法因文字傳承斷裂之故，已經湮滅在秦國的鐵蹄之下，至今不能復睹；秦滅巴蜀之後，巴蜀書法以秦國文字為載體，湧現出了《青川木牘》等著名作品；兩漢巴蜀書法則迅速地達到全國最高水準，著名書家、書作、書論井噴而出，彪炳千秋，在今天已成為國家之瑰寶，民族之驕傲。

作者單位：西華大學人文學院

漢將軍紀信故里考

馬正平

引言：紀信將軍其人

在中國歷史上，紀信並不是一個人人熟知的偉大英雄。在他的同輩中，他不如張良、陳平之顯赫，也不如韓信、樊噲之威名。但他的確是漢代乃至中國歷史上一個十分重要的歷史人物，一位難以磨滅的千秋英烈。一方面，他成為歷史發展的催化劑。當漢王劉邦被楚王項羽困於滎陽，即將束手就擒萬分危難的時刻，正是大將軍紀信主動請纓誑楚以身殉國，使得劉邦有機會逃離滎陽，重振旗鼓，最後打敗項羽，使漢王朝得以國家統一，鞏固安寧，輝煌昌盛。據載，劉邦為了報答紀信將軍的救命救國之恩，遂將紀信故里從保寧（閬中）府析出，特置“安漢縣”^①。實際上，楚漢相爭之時，劉邦的政權還是一個地方政權，與後來的全國統一的漢王朝並非一回事，從這個意義上說，紀信誑楚的偉大意義在於奠基、開創了漢代基業。因此，後來宋朝加封紀信為“忠烈侯”的誥詞云：“以忠殉國，代君任患，實開漢業。”^② 這樣，說紀信誑楚有“開漢之功”是有道理的。從“安漢”、“開漢”的措辭中，自然突顯了紀信將軍的不可取代的歷史地位。另一方面，從倫理學、文化學的意義上來看，紀信將軍這種殺身成仁、為國捐軀、視死如歸的英雄主義，是中華民族不朽的軍魂武德和引以為榮的精神文化遺產。他死後，唐、宋、元、明、清及民國政府多次對他進行追封、悼念，將軍永逝，浩氣長存！

但在劉邦後來的“功臣表”中並沒有紀信的位置。於是，後世志士仁人對此表達了極

① [明] 李賢等：《明一統志》卷六十八。

② [宋] 祝穆：《方輿勝覽》卷六十三。

大的憤慨與不平。唐李德裕《三良論》說：“自周漢迄於巨唐，殺身成仁，代有豪傑，莫不顯一身之義烈，未有繫一國之存亡。唯紀信乘黃屋以誑楚，赴丹焰而存漢，數千年間一人而已，漢祚四百，由此而興。余謂漢祖封建紀氏，宜在曹蕭之上，報德未稱，良可悲也。”^①唐代著名詩人李商隱《詠紀信》詩云：“本爲留侯慕赤松，漢庭方識紫芝翁。蕭何祇解追韓信，豈得虛當第一功。”^②宋王禹偁《讀史》詩云：“紀信生降爲沛公，草荒孤壘想英風。漢家青史緣何事，卻道蕭何第一功。”^③元代著名詩人、書法家趙孟頫《紀將軍》詩云：“酒酣斫劍氣如雲，屠狗吹簫盡策勳。漢室功臣誰第一，黃金合鑄紀將軍。”^④

更爲不幸的是，紀信還受到了歷史學家司馬遷與班固的冷遇。司馬遷祇在《史記·高祖本紀》中略略點了一下他的事迹，卻不予褒貶。班固在《漢書》中也爲了突出高祖而淡化紀公，這自然也受到後來歷史學家的批評。宋人章如愚憤慨地說：“司馬遷取予戾於聖人。……以《紀》考之以五帝，則不紀少昊。於西漢，則不紀惠帝。……以《傳》考之，若刺客則有傳，若游俠則有傳，若佞倖、滑稽則有傳。紀信，義士也，英烈之言可畏，而反無一辭以褒之，俾與庸夫並朽而腐，可勝嘆哉！”^⑤宋王楙也謂：“班史於節義事，率多疏略。如紀信誑楚而燒殺，不爲立傳，周苛罵羽而烹死，因《周昌傳》略載，此固失矣。”^⑥這些論斷，可謂一語中的。

一 名人故里的基本特徵、條件

關於紀信的故里，史料記載有幾種說法：“1. 隴西成紀人^⑦；2. 趙城（洪洞）人^⑧；3. 西充人^⑨；4. 湖南澧州人^⑩。

紀信將軍的故里究竟是在何處呢？要對這個問題給出真實科學的結論，我們必須首先討論名人故里的基本條件和特徵，以此作爲名人故里的認定標準。

一般說來，要證明一個地方是某名人故里，必須符合這樣兩個特徵條件：一方面，是名人故里的物質性存在的要素；另一方面，是對這些要素的記載論述的可信性依據。

關於前者，主要應包括：第一，有無故居、故宅。故居、故宅是名人基本的生存空間條件，沒有這個基本的生存條件是沒有這個名人的存在的，因此，故居、故宅是名人故里的最

① [宋] 李昉等：《文苑英華》卷七百五十七。

② [宋] 阮閱：《詩話總·後集》卷十四。

③ [明] 李荃：《藝圃集》卷二。

④ [清] 顧嗣立：《元詩選》初集。

⑤ [宋] 章如愚：《群書考索別集》卷十二。

⑥ [宋] 王楙：《野客叢書》卷一。

⑦ [清] 《甘肅通志》卷三十七“忠節”。

⑧ [清] 《山西通志》卷一百十“人物”。

⑨ [宋] 邵博：《紀信將軍碑》，見《西充縣志·藝文志》，康熙六十一年版。

⑩ [清] 《湖廣通志》卷十二《山川志》。

為基本認定條件。第二，有無墓葬，尤其是家族性墓葬。在一般情況下，有墓葬，尤其家族性墓葬的地方，是名人故里的可能性非常大。第三，有無與名人事迹相關的地名。地名是一種凝固化的民間歷史符號。一些地名往往是和名人的生活經歷和有關事件聯繫在一起的。第四，有無鄉賢祠性質的祭祀性祠廟。祠廟是最重要的紀念和祭祀的場所。在封建社會，在名人、偉人的家鄉一般都有紀念性和祭祀性的祠廟。第五，是否被歷朝歷代官方所公認。名人的故里除了名人家鄉的人以外，最瞭解真實情況的就是歷朝歷代的官方政府，尤其是加封、敕修等行為更要求十分準確的資訊。可以說這一條是確定名人故里最為重要的依據之一。第六，有無可信的歷史記載。這種記載包括三種形式：一是官修正史，二是地方志的記載，三是野史傳說等口述歷史。

歷史記載是一種文字記錄。那麼，什麼樣的歷史記載具有歷史的真實性呢？一般說來，應該具備三個特點：第一，記載的時間性，一般說來，越早的記載越真實可靠；第二，記載的具體性，一般說來，時間、地點的記載越具體越真實可靠；第三，記載的連續性，凡是某種故里元素被歷代連續記載的，就較為真實；第四，記載的官方性，因為官方擁有最權威的資料，所以，官修正史的記載較為準確。上述故里因素占有得越多，證據鏈越長，越具有立體性、整體性、邏輯性，那麼這個地方作為名人故里的可能性就越大。

二 紀信的老宅、故居

關於紀信將軍的老宅、故居的記載有兩個地方。一是四川“西充高陽里扶龍村”，一是湖南“澧州將軍山”。關於前者，最早見於明代《蜀中廣記》：“其大陵鎮，則有扶龍山。蓋紀信，此縣人。生在高陽之扶龍村，祠在紫巖”^①。《明一統志·順慶府》：“古迹”條云：“紀信宅，在西充縣高陽里扶龍村。”^②《欽定大清一統志》：“紀信故宅，在南充縣東三十里。”^③《四川通志》云：“紀信故宅，在縣東三十里高陽里扶龍村。”^④又，明萬曆四年（1576），西充縣知縣馬騰雲在城西鐵印山南面的王爺埡口立有“漢將軍紀信故里”碑，碑高九尺餘，寬三尺餘，碑厚一尺餘，碑座四尺見方^⑤。另外，在河南鄭州邙山區古滎鎮紀公廟村的“紀陵”，有一塊民國三十年（1941）五月國民政府銓敘部部長李培基撰文的《漢紀將軍信贊》的石碑，其碑文曰：“廟在安漢，宅在西充。合茲新構，長仰英名。”這裏也認為紀信將軍的宅第是在“西充”縣。

關於後者，最先的記載是清《湖廣通志·澧州》：“將軍山，在州南六十里。世傳漢紀

① [明] 曹學佺：《蜀中廣記》卷二十七《名勝記》。

② 《明一統志·順慶府》卷六十八“古迹”。

③ 《欽定大清一統志·順慶府》卷三百“古迹”。

④ 《四川通志》卷二十六“西充縣·古迹”。

⑤ 《西充縣志》，康熙六十一年版。

信所居。紀信，忠事漢王，人義之，立祠其上。”^① 又《欽定大清一統志·澧州》云：“紀公廟，在州東南六十里將軍山。祀漢紀信，相傳爲信所寓地。”^②

上述資料是歷史上關於紀信故居、老宅的全部文字記載。根據上述記載，我們可以看出，關於紀信的老宅、故居是湖南澧州的記載較晚、較少，記載的語氣是“傳說”的懷疑的口氣。更爲重要的是關於“澧州”的記載，沒有任何其他相關的證據鏈來證明。而關於紀信的故居、老宅在西充高陽里扶龍村的記載最早、最多、最連續，具有較長的證據鏈和整體性、邏輯性，而且記載的語氣沒有懷疑。更重要的是，國民政府銓敘部部長，作爲國家管理意識形態的最高長官，其所指應該是有依據的。因此，可以看出，紀信的老宅故居在“西充高陽里扶龍村”的記載比較符合歷史真相，具有較強的邏輯性和較高的可信度。

三 紀信墓葬及其家族墓葬

滎陽之戰，紀信誑楚，被項羽燒死。後來人們在滎陽（今鄭州市邙山區古滎鎮紀公廟村）修了紀信墓、紀信陵。據說，紀信墓建於西漢。而關於紀信墓的最早記載見於北魏酈道元《水經注》：“滎陽縣故城南，漢王之困滎陽也。紀信曰：‘臣詐降楚，王宜間出。’信乃乘王車出東門，稱漢降楚。楚軍稱：‘萬歲’，震動天地，王與數十騎出西門，得免楚圍。羽見信，大怒，遂烹之。信冢，在城西北三里。故蔡伯喈《述征賦》曰：‘過漢祖之所隘，弔紀信於滎陽。’”^③ 其後，《魏書·地形志》、《唐會要》卷二十二、宋《太平寰宇記》卷九、《續博物志》卷九、《明一統志》卷二十六、清《河南通志》卷四十九、杭世駿《諸史存疑》都有詳盡的記載。應該說，紀信墓在滎陽是沒有什麼疑問的。所以，唐高宗於麟德二年（665）十一月到滎陽以少宰禮祭祀紀信墓，並追贈“驃騎大將軍”。後來，唐吏部侍郎盧藏用還爲滎陽紀信墓寫了《漢忠烈紀信碑》碑文，歷代均有記載^④。可見，滎陽紀信墓是得到了官方的確證認可的。

但是，關於紀信的墓葬之地，還有另外幾種記載。例如，《明一統志》就說：“紀信墓在秦州（今天水）北門，墓側有廟。”^⑤ 清《甘肅通志》也沿此說。又清《山東通志·濟南府》云：“漢紀信墓，在縣西北四十里昌國城，見元魏《地形志》。”又，清《畿輔通志·正定府》云：“紀信墓，在晉州東百五十步。舊志：明嘉靖，己酉，知州黃明良立石以識。”《畿輔通志·房山縣》云：“韓村饒陽縣黑山寺亦有紀信墓。未詳孰是。”顯然，上述幾個地方的紀信墓都是爲了紀念、祭祀紀信而建，與紀信故里沒有什麼關係，即使是滎陽的紀信墓

① [清]《湖廣通志》卷十二《澧州·山川志》。

② 《欽定大清一統志》卷二百八十七。

③ [北魏]酈道元：《水經注》卷七。

④ 見[宋]趙明誠：《金石錄》卷五、[宋]陳思：《寶刻叢編》卷五。

⑤ [明]李賢等：《明一統志》卷三十五。